

外国民俗文化研究名著译丛

钟敬文 主编

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КОРНИ
БОЛШЕВНОЙ СКАЗКИ

[俄] 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 著 / 贾放 译

中华书局

I512.077

2

2006

外国民俗文化研究名著译丛
钟敬文 主编



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

[俄] 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 著 / 贾放 译
/ 施用勤 校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俄罗斯)普罗普著;贾放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6
(外国民俗文化研究名著译丛/钟敬文主编)
ISBN 7-101-05020-4

I. 神… II. ①普…②贾… III. 民间故事-文学
研究-俄罗斯 IV. I512.0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05428号

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

- 丛 书 名** 外国民俗文化研究名著译丛(钟敬文主编)
著 者 [俄]弗·雅·普罗普
译 者 贾 放
责任编辑 金 英 刘淑丽 张彦周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6年11月北京第1版
200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 字数352千字 插页3
印 数 1-4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5020-4/Z·542
定 价 36.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钟敬文

近几年,人们都在谈论全球化、现代化的问题,这使我联想到世界的和中国的民俗学。广泛一点说,中国民俗学,它的历史渊源和种种成就,是带有中国自己的特点的,但它的兴起和发展,又是世界民俗学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差异面上的共同点,在各国民俗学史上都存在。不过,由于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民族众多、民俗丰富,加上封闭较久,在民族民俗的差异面上,可能体现得更为明显而已。中国民俗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正是这种民族民俗。她是中国人的生身文化,任何中国人都有她的亲子标记,都受过她的哺育和抚养,这种民族性是与之俱来的。从另一方面说,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又是世界性的。二战以后,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纷纷步入现代社会,人文社会科学也迅速进入现代方法论时期,民俗学国际化的共同点,也日益凸现出来。各国各民族呼吁建立多元文化格局,同时共享民俗资料,提高对民俗的理性认识,推动了民俗学的新发展。相比之下,越是世界发达国家,对民俗越重视,民俗的理论研究成果越丰富,有些还涉及到中国民俗研究,这对中国民俗学者来说,也是一种启示。我们现在正在致

力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自然应该根据我们的社会实际,进行我们的探索实践。但是,也应该看到国际学界的这种新变化,吸取其他先进国家研究人民文化(民间文化)的创造成果,启发我们自己的创造活动,加速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所以,最近以来,我一直在想应该出版这套书,也在思考这类译著的学术价值。

在我国现代民俗学史上,翻译、出版译著之事,从“五四”就开始了。从世界范围看,在民俗学发展上,欧美国家要领先一些。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东亚地区的中、日、韩国家的民俗学先后崛起,日本比中国略早几年,中、韩差不多。后来由于内外形势的变化,我们的动作要稍慢一些,别人跑在了前面。当然,各国民俗学的性质不大相同,但是,外国学者所取得的理论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们叫他们“先行者”。“五四”时期,北大已开始有在《歌谣》周刊上刊登翻译外国理论的文章,在当事人中,就有支持搜集歌谣学运动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还有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江绍原等一批学者。到中大时期,在我编《民俗》杂志的时候,曾邀请何思敬撰稿,他在日本学社会学,在那里接触了英国的民俗学理论。以后,杨成志留法回国,更多地介绍了欧洲的民俗学理论。到杭州时期,我们中国民俗学会的活动,是同德国人类学界和日本民俗学界有来往的,其间杨堃做过法文理论的翻译工作,但我们当时的主要范本,还是英国班恩女士的《民俗学手册》。^① 上述译者,大都曾留学国外,或接受过外国的学术理论。我个人所受到的影响,主要有英国人类学派的民俗学,法国社会学和日本民俗学等。总之,外国理论对中国民俗学的起步和初建,的确起到了相当的助力作用。

^① [英]班恩(Charlotte Sophia Burne)《民俗学手册》,程德祺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

不过,早期民俗学的译著或译文,多是片断的,不成系统的;在接受心态上,中国学者也有以构筑自己学问的需要为主的倾向,不能全面地反映和运用对方的理论,这些不足之处,也是应该看到的。

后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与外国学界相隔绝,这时他们的民俗学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抓紧恢复了翻译的工作,如连树声等翻译了泰勒、弗雷泽的名著,^①影响较大。我曾和刘魁立同志商量,还要再翻译一些民俗学的专门著作,如日本柳田国男的《民间传承论》和《乡土生活研究法》,法国山狄夫的《民俗学概论》,德国汉斯·诺曼的《德国民俗学纲要》(二战前的版本),意大利格赛普·科奇亚拉的《欧洲民俗学史》和美国道森的《美国民间传承》等。这种工作,同撰写中国民俗学著作是一样重要的。

80年代以后,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学术界引进外国理论学说的活动更加活跃,大批西方民俗学著作和海外汉学成果被介绍进来,包括阿兰·邓迪斯的《民俗学研究》(中文译名《世界民俗学》)、布鲁范德的《美国民俗学研究大纲》(中译本改为《美国民俗学》)、詹姆森的《中国民间传承三讲》(中译本改为《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民俗》)、伊藤清司的《中国大陆古文化与日本》、李福清的《中国神话故事论集》、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洪长泰的《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和欧达伟的《中

① [英]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英]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人类学》,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此两书皆在刘魁立主编《原始文化名著译丛》中。另见[英]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金枝》,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此著的翻译出版,同样是我国民俗学开放发展的一个标志。

国现代民众思想史论——20世纪初—1949年华北地区的民间文献及其思想观念研究》等。^①国内出版界在这些民俗学著作和相关理论的译介上,做了不少工作,有些还是十分重要的。

值得提出的是,新时期的译著翻译工作产生了新的效应,促进了我国民俗学者的学术反思。例如,把西方民俗学理论当作参照物,反思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历程,激活了我们自己的学术空气,阿兰·邓迪斯和布鲁范德的著作都发挥此种功能。另一种情况是,通过译著,了解到海外汉学界使用中国民俗资料的成果,发现了相互之间的长短所在,更加激发了自身的学术干劲,也提高了对民俗学领域和前程的认识,这时詹姆森、艾伯华、李福清、丁乃通、伊滕清司和洪长泰等人的著作,在某种意义上,都成了反光镜和兴奋剂。

在这些译著中,中国民俗学者发现,你在翻译人家,人家也在翻译你;还发现了中国民俗是怎样一个硕大的花园,怎样吸引了大批外国学者不远万里前来勘查和探秘,而我们自己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学术历程,也已经能够摸到接受外国理论的一个“度”,和提出自己的学术方向,并对此加以说明。例如,上述一些译著中涉及

① [美]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世界民俗学》(The Study of Folklore),陈建宪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美]布鲁范德(Jan Harold Bruwand)《美国民俗学》(The Study of American Folklore: An Introduction),李阳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美]詹姆森(Raymond D. Jameson)《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民俗学》(Three Lectures on Chinese Folklore),田小杭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美]丁乃通(Nai-Tung Ting)《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郑建成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德]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王燕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美]洪长泰(Chang-tai Hung)《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董晓萍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美]欧达伟(R. David Arkush)《中国现代民众思想史论——20世纪初—1949年华北地区的民间文献及其思想观念研究》,董晓萍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

到有关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整理工作,在 19 世纪后期,已有一位当时住在香港的英文杂志办刊人兼编辑戴尼斯尝试过。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我自己也做过一些努力,整理了几十个故事类型,先后在国内的《开展月刊》(民俗学专号)和日本的《民俗学》上刊载。但我刚走了几步,就停脚了。到了 30 年代后期,德国人类学者艾伯华以德文刊行了《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一书。至 70 年代末,丁乃通又出版了英文专著《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此时距我早年的工作已经过去四五十年了。现在看到它们的中文译著,不禁感慨万端,因为,从我所长期接触的中国民间故事资料看,这种探索成果,对整个故事学的建立是有益的,对我们的研究说,也是有益的借鉴。但作为一种主要的观点和方法,跟我们所理解的和所要求的中国故事学相比,还不免有一段距离。我所指的是,应该把故事当作一种人民的精神产物来对待,而不能只像故事类型学派那样,把它当作一种结构形式来拆解。特别是在研究中国故事上,还要研究它所联系的社会生活、文化传承、讲述活动和表演情境等,而不能只分析它的情节单元,这样才能得出比较适当的结论。

从外国民俗学或相关海外汉学的学术传统来说,他们所培养的学者,在学术训练上,又有很多的优异点,胜出一筹,这是应该承认的。面对他们的工作,中国民俗学者自我反观,经常会大有收获,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在许多译著中,外国学者所表现的严谨自律态度,特别对所使用资料的来源、记录的情况以及可靠程度等方面,所做的周密考察,往往给我们的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他们的研究视角新颖,却又不是刻意地标新立异,而是根据对象的实际探索,缜密地分析,步骤扎实而论证丰富,纵然是零篇小幅,也能起到煌煌专著未必能企及的作用。他们的博学和善于运用理论,以

及对于个人观点和对于别人的结论之富有分析和断制的能力,无疑加强了其研究成果的力度。他们在科学研究中所表现的人文主义精神,更加富有吸引力和感召力,让世人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会比较亲近,而不是看得高不可攀,或冰冷无情。特别是那些研究我们自己熟悉的中國民俗资料的现代译著,中国人的感受会更为直接,会找到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自90年代中期起,在国际民俗学界,翻译工作出现了新的说法,即翻译文化。各国学者强调不同文化及其不同学术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沟通和相互繁荣,而不存在谁统治谁、谁接轨谁的问题。对于民俗这种民族性极强的文化现象,尤其如此。这不是说,理论和方法之间没有高下,彼此的研究成果没有优劣,肯定不会是这样。它是主张从文化本身看问题的,这也开辟了认识民俗学译著功能的又一层次。前不久,我给研究生做过关于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讲演,已经谈了这个问题,我对他们说,中国民俗学与外国理论能不能接轨?这要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来考虑。大体上说,中外文化交流,对双方都是好事,但说到不同文化的接轨,就要考虑接轨的对象。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民俗文化及其科学研究,要跟外国的理论去接轨,这比起一般的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对外交流,是肯定有其特殊的地方的。就民俗学本身而言,可能有些方面想去接轨,但有的时候就不一定接得很好。可能你想接轨,在他们看来,还不够,搭不上。也可能他想接轨,在我们看来,又说到点子上。这种差异,是由各自的人民生活、文化传统等的不同造成的。译著中所反映的文化亦然。民俗学译著的翻译目的,是要了解不同文化怎样向别人介绍自我文化的民俗文化,也要了解自我民俗文化怎样在不同的文化中获得了方法论意义、理论形态和学术地位,变成了被重视、被比较和被广泛运用的文化,等等。从

文化的视角出发,可以使我们在看待外来学说时,头脑更复杂,分析更客观,心态更健康。确切地说,这套译著,正是建立在这一思考之上的。

对投入译著的人来说,无论是译者还是读者,我的看法是,都要解决观念问题。将外国理论介绍进来殊非易事,需要正确地处理好两个因素:一是译者的因素,一是接受者的因素。从译者的因素说,选书很要紧。如果不是很重要的东西,就不一定需要介绍。对重要的外文书籍,如果被选择翻译,那么译者就要通晓它,还要用合适的中文来表达它。在此,我感到需要强调的是,译者除了解决语言上的问题外,对人家的理论也要熟悉。不然的话,译出来的中文,中国人就不容易看懂,还可能产生误解。“五四”时期,胡适之介绍杜威的实证主义,中国人原来是很陌生的,没有接触过。但经他翻译,通俗易懂,让人很容易接受,那时我还是一个中学生,也能看懂,可见他的外文能力和文字功夫。他已经透彻地掌握了人家的理论,再用中国人能懂的话写出来,就成了真正的思想文化翻译,而决不是字面上的照搬。

从接受者来讲,要接受译著的理论,就必须消化。即便是很忠实、很明白的译文,对另一个文化成员来说,接受起来也是很可能会有障碍的,因此要有主动消化的心理准备。我也常看外国译著,比如荣格的《后期精神分析学》,看了并不十分了然,要让我具体地去讲解他的学说,我还必须下功夫钻研,才能用自己的话传达给别人。现在有些人,就像中国古人所说的那样,“囫囵吞枣”,其实并没有吸收到什么养料。枣子到了口里面,只有经过细细地咀嚼,才能消化,整个吞下去是没有用的。要接受一种外来的理论,特别是要了解外国学者所阐释的他本人所研究的民俗文化的新观点和新方法,还要运用到我们的研究中去,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生

吞活剥是不会有好的效果的。

从文化事物本身看,它也往往有许多方面,理论却是偏于一点的。所以,对于外来理论,我们要知道其短处在什么地方,长处在什么地方。没有任何理论是万能的。作为一个民俗学者,要运用某种外来理论,就要有距离感。结构主义也好、象征主义也好、故事类型方法也好,都可以使用,但要知其使用的限度,和应用于什么对象才合适。20年代末,我和杨成志翻译了班恩书中所附印度—欧罗巴故事类型,我就给应用了,写了中国的故事类型,好像背后跟着的人还不少,其实这中间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当时我年轻,不懂,现在知道了,我愿意把这个经验告诉大家。

更重要的是,我们翻译、学习外国理论著作,不是为了翻译而翻译,为了学习而学习,而是要借他人之梯,登自己之峰,发展自己的学术思想,这样才能创造与国际一流学者平等竞争的局面。还要知道,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仅用一种理论去研究(包括本土的或外来的),都是不够的,应该提倡多角度的综合研究。比如,对于农谚,你可以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去研究,也可以从历史学的角度去研究,或者从政治人类学的角度去研究,美国历史学家欧达伟就做了这样的工作,他给我们的研究生讲过课,反响很好。再如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论”(日本译作“机能论”),对于文化现象、民俗事象,有较大的解释力,但它主要适用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结构、社会制度和资本经济的研究,对地方的、分散的、口头的和传承的民俗研究,就不一定起作用,法国年鉴学派学者最近已指出此点。当然,任何民俗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切事物都有历史性。那些来自不同文化的译著,正可以展示多种可能性,可以用来充实我们自己民俗学的工具库。

这套丛书的总题目叫《外国民俗文化研究名著译丛》,是考虑

到现代国际学界的形势。前面提到,二战以后,特别是 60 年代后,在“民俗”的对象上,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 and 文艺学等,都表现了共同的兴趣,不同学科在各自领域内都取得了成果,有的还取得了理论和方法上的重要突破,带动了整个下层文化研究思潮的发展。在这股巨大的世界浪潮中,凡成功之作,大都有些相似之处,即对象是民俗,重点是下层普通人民,热点是文化。选择“外国民俗文化研究名著译丛”冠名,正在于可以从多方面汲取精华,展现全局,观照民俗学。在诸多的优秀成果中,我们选择的书目对象,是一批公认的现代经典名著,原著者都是世界学坛上的领军人物、民间文化研究某一方面的开拓者,他们的著作曾在世界多个领域内产生过重大影响,被许多国家的学者所反复引用,长期起到了学术奠基作用。首批出版的译著有:洛德的《故事的歌手》、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和《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鲍曼的《故事、表演和事件》以及杜德桥的《妙善传说》等,相信它们的面世,会推进我国民俗学的理论建设、乃至整个民间文化研究事业的发展。

这套丛书的译者,全部是北师大民俗学专业毕业的博士、教授或副教授。他们曾赴原著者所在的国家留学,跟随原著者本人或他们的亲密弟子、周围学者,从事过本专业的深造和相关研究,对原著的前驱地位、理论内容、思想要点和表达风格,有着较为切近的了解,对原著者所使用的专业术语、特殊文献用语和田野资料用语及其转译的方式等,都与对方直接交换过意见,协商了解决的办法,力求完整地展现原著原文的风貌。对译著的中文水平,他们也有清醒的追求。所以,由他们充任译者,我想是可以得到较高的质量保证的。

通过这些译著,希望能够打开一扇扇新的世界之窗,让广大读

者看到,在这世界上林林总总的国家、民族(特别是那些现代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民族)中,在这方面的现代科学活动上,现在又有哪些新表现?已取得哪些新的理论和方法?有什么样的学术花朵和成果可供观赏和取资,以及在怎样一个程度上,我们自己的学术成就就可以与之对话,并形成平等、友好的学术竞争新格局?鲁迅所谓的“拿来主义”,就是要首先拿来,然后加以辨别、去取。如蜜蜂采蜜,先采来百样的花粉,再酿就自己的香蜜,健壮自己的肌体。我也赞成季老所说的“送去主义”,即把中国民间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主动向外传播,以利于世界其他国家、民族了解中国人民、了解中国文化。我们拿来并翻译这些优秀外国著作的结果,应该是送出我们自己的国货精品,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这种做法,是符合于实事求是的原则的,也是符合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俗学界的一些专业期刊,以及出版社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编辑部门,已做了不少介绍工作,这些都是有意义的和有成效的。可惜还比较分散,新书也少,一时还跟不上现代世界民俗学迅速发展的步伐,不能让学习者感到充分的满足。现在这个译丛的出版,可以做必要的填补。

最后,我要郑重地向接受此套丛书出版工作的中华书局领导致谢!我们的财力还不宽裕,然而,他们却以十分的明智和贤达,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和资助。一并感谢责任编辑金英同志,她的辛勤劳动,我想读者是会默记在心的。

2001年7月,时年九九。

序 言

本书增补了绪论,因而序言部分就可以仅限于做几点技术性的说明。

书中常常会遇到故事的引文或摘录,这些摘录当被看作是例证而不是作为论据。一个例子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对一种现象进行分析时,似应不是援引一两个例证,而是穷尽所有的情形,可那就会把这本书变成一本其规模超过全书的目录索引。引证现有的情节索引或母题索引,似乎可以避免这一困难。然而,一方面,这些索引所采用的按情节划分故事和按母题划分情节的方法,常常完全是相对的,另一方面,故事引文在书中要遇到成百次,那好象就得成百次地给出引文索引。这一切迫使我放弃引用每个情节类型号码的传统。读者将会明白,书中所引用的材料是一些范例。

还要说到习俗、仪式、祭祀等领域的例子。所援引的所有事实——不过是作为例子而已——其数目似可以任意增减,所援引的例子似可以为其他的例子所替代。如此一来,书中便不曾说出任何新的事实,新的只是所确定的事实之间的关系,全书的核心正

在于此。

关于叙述方式还要做一点说明。故事母题之间的关联是如此密切,以至于作为一条规则,任何一个母题都无法孤立地去理解。叙述则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进行。因此在书的开头常常会遇到在下文才会展开的引文,而在书的后半部分,又会碰到上文已经叙述过的东西。

一本书是一个整体,不可为了查阅某些母题而从中间读起。

在本书中读者找不到对许多母题的分析,读者是有权在这类著作中寻找它们的。许多东西在这本书里容纳不下。本书特别强调对一些基本的、最主要的故事形象和母题的分析,其余的东西,一部分以前已经发表了,此处不再重复,一部分则可能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在今后发表。

这本著作写成于列宁格勒大学。我的许多同道乐于让我分享他们的学问和经验,支持我写作此书。许多地方尤其要归功于伊万·伊万诺维奇·托尔斯泰教授,无论是在我运用古希腊罗马材料的章节,还是写作的一般问题,他都给予了我以宝贵的指教。请允许我向他致以深深的、真挚的谢意。

作者

俄文第二版编者说明

此书为弗·雅·普罗普的学术著作《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的第二版,该书于1946问世。作者是在战争年代完成这本书的,他无法为核对引文和准确说明出处而再次查对原著,他只能使用以前做的摘录或凭记忆指出史料来源。М. Я. 敏茨在恢复本书的索引附录方面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编辑们为此向她致以深挚的感谢。

这一版对引文做了准确的说明,对脚注做了核对和补充。这些引文和脚注依照新的出版标准进行排版。例如,重新校对了引自不同故事集的大量引文。对引用的故事文本和故事异文的号码进行了勘误。阿法纳西耶夫故事集《俄罗斯民间故事》里的故事编号用的是弗·雅·普罗普注释的版本(莫斯科,1957),这是由于当代读者使用1936—1940年三卷本的文本因两个情况而有些麻烦:它已经绝版;同时引证文本的异文又很不方便,这些异文既有基本文本又有阿法纳西耶夫加了注释的文本,都放在同一个号码之下。在弗·雅·普罗普注释的版本中全部文本有严整的编号。出自阿法纳西耶夫“注释”的故事有了单独的号码。脚注与

书末的号码相一致,这使读者易于寻找异文对应的引文。根据弗·雅·普罗普在第一版序中的看法(参见本书“俄文第一版序”),编辑未采用相应的故事情节索引的故事类型编号。弗雷泽论著《金枝》的引文也引自最新版本(莫斯科,1983),那些最新译文中没有对应引文的情形除外。外文词语和外文名称进行了核对,在文本中给出了译文。补足了删节部分并使之准确化。指出了弗·雅·普罗普所引用文献的最新版本。视需要引述了一些研究介绍,包括弗·雅·普罗普书中所揭示的问题范围之内的众家之说,或者是《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出版之后引起学术论争的问题。

编辑们尽力小心翼翼地对待第一版的文本:一些个别无关紧要的删节,涉及的只是书中顺应问世之时代风气的地方。它们丝毫无损于书的内容。第一版里的一些过时的民俗学术语和地理名称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在文本里碰到。